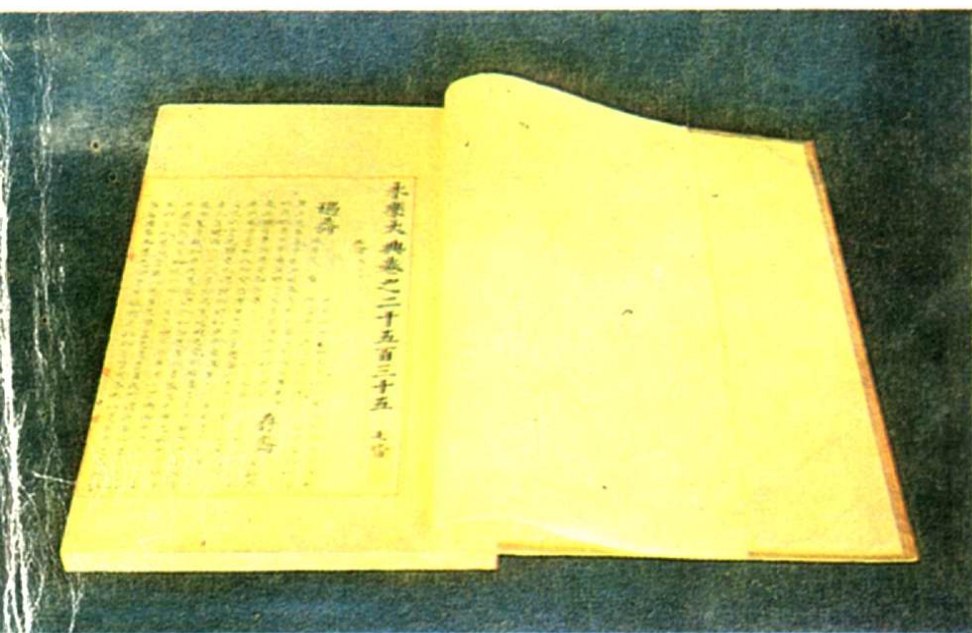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

100305

北京出版史志



北京出版事略(下)

北京古代出版机构考述(上)

新中国北京地区出版科研述略

北京清以前重要社会科学图书简介

北京地区的出版教育与培训

新闻出版署涉外工作概要

第9辑

北京出版社

BEIJING CHUBAN SHIZHI



校 雛 俑

北京出版史志
BEI JING CHUBAN SHIZHI
第九辑
〈北京出版史志〉编辑部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100011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58000字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800

ISBN 7-200-03145-3
K·320 定价:7.40元

目 录

北京出版史志

第 9 辑

-
- 北京出版事略(下)(1977—1994年) 方厚枢(1)
北京古代出版机构考述(上)..... 宋平生(26)
-

• 燕京出版史事 •

- 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的出版..... 朱宗霞(38)
新中国北京地区出版科研述略..... 魏玉山(41)
-

• 京华出版苑 •

- 北京清以前重要社会科学图书简介
..... 爱新觉罗·常林(49)
建国后北京地区政治书籍出版举要..... 王 冠(103)
建国后京版的教育图书..... 赵良珍(115)
80年代以来京版的社会学图书出版概述 ... 曹鹤龙(146)
-

• 音像图书 •

- 我国音像出版的现状和发展态势..... 建 华(169)
-

• 电子出版物 •

出版方式上的一次革命

——浅谈电子出版物的崛起…………… 田 耕(172)

• 建置与沿革 •

“文革”前文化部出版事业

管理局机构变化情况…………… 柴章骥(185)

• 出版机构 •

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主要成果…………… 邵益文(189)

• 出版管理 •

北京地区的出版教育与培训…………… 梁子杰(192)

• 书籍装帧 •

北京图书装帧艺术说略…………… 王 晖(199)

• 期刊博览 •

《出版发行研究》十年概述…………… 朱 詮(214)

• 对外合作 •

新闻出版署涉外工作概要…………… 楚 槐 (220)

• 资料 •

五四运动时期北京的文学社团(25)城市志(40)80年代末的一次出版整顿(114)毋昭裔发愤践言作“家刻”(168)五四运动时期北京三种著名杂志(188)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(198)丛书嬗变(224)

北京古代出版 机构考述 (上)

宋平生

北京古代的出版机构情形各异，有的是专职的，例如刻书铺，再如辽代的印经院、元代早期的兴文署、明代的经厂、清代的武英殿等。它们一般都拥有包括写工、刻工、装订等工匠在内的出版班底。有的是兼职的，例如金代的国史院、都水监；元代的国子监、太医院；明代的都察院等一些在本职工作范围之外出版过一些图书的官衙。它们大多没有专职的刻书班底，通常是由自己出资，将编定的书稿交由书坊或其它刻书机构雕印。此外，寺院、道观和私宅出版图书的情形，亦大多与其相近。而作为出版业中坚的官方出版机构，除极少数是专业性的以外，绝大多数均属兼职或偶一为之者。但无论它是专职的，还是兼职或偶一为之者，只要它确实出版过图书，便均在本文考述之列。

一、辽代的出版机构

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北京古代出现有文献可征的出版机构，始于辽代。

契丹族原为居于辽河上游的潢河（西拉木伦河）一带（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）的游牧民族，进入中原北部地区后，开始接触中原文化，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。至辽圣宗时，领土东临日本海，西抵天山，朝贡国六十有余，连宋朝每年亦向辽国贡奉银、绢三十万两、匹，成为当时东亚最富强的国家。

由于国力强盛，因而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。圣宗开泰元年（1012年）八月，那沙乞赐佛像、儒书。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一部。道宗清宁元年（1055年）十二月，诏设学养士，颁《五经传疏》。咸雍十年（1074年）颁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。这些都是辽代刻书的珍贵史料，可惜我们已无法考知上述诸书是由何机构所雕印的。

辽代的刻书中心在南京，又称燕京（即今北京），为辽五京之一，它是辽国在北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尽管辽代刻书传世甚少，但我们通过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圣宗统和年间（983—1011年）雕印的《辽藏》（又称《契丹藏》）残卷，尚能对当时精良的雕印技术和巨大的出版能力略窥一斑。这些经卷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辽代版刻实物，还提供了一些有关辽代北京出版机构的珍贵资料。

（一）官方出版机构

印经院 关于辽代的印经院，过去一向无人知晓。由于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出土的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》和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》中有“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”的署名，才有人提出“辽在燕京设印经院，专门从事刻经”的论点^①。李致忠先生进而认为“这说明《契丹藏》的雕印很可能由印经院主持”。^②

（二）寺院刻经

辽代统治者崇尚佛教，常赐寺院以大量的人畜土地，寺僧亦放债以营利。由于寺院饶于资财，所以才有力刻经。

1. 燕台圣寿寺 刻书现存《辽藏》残卷《称赞大乘功德经》。卷末镌有“燕台圣寿寺……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

^① 引自《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》，载《文物》1982年第6期。

^② 李致忠著《历代刻书考述》第117页。

冀生五叶记，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，穆咸宁、赵守俊、李存让、樊遵四人同雕”题记，记录了此经的雕印地点、时间、书写者和刻工。据此可以推论，《辽藏》很可能是辽代统治者诏令一些寺院联合雕印而成的。

2. 燕京弘法寺 刻书现存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》和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》。镌有“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，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，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，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远校勘，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”题记。雕印时间是辽道宗咸雍七年（1071年）十月。

3. 燕台大悯忠寺 刻书今存《新雕诸杂赞》。悯忠寺即今法源寺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，寺址在宣武门外西砖胡同。

（三）书坊

1. 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冯家 刻书现存辽圣宗太平五年（1025年）所刻《妙法莲华经卷第四》，镌有“摄大定府文学庞可升书，同雕造孙寿益、权司展、赵从业、弟从善雕。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。经板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、武骑尉冯绍文柚（抽）己分之财，特命良工书写，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，印造流通。”^①题记。知此经系辽朝官员冯绍文出资请良工写版，并委托冯家书坊雕印。写版者庞可升是辽代著名书法家，辽圣宗太平五年（1025年）宝坻广济寺碑即出自他的手笔。此经写刻俱佳，为辽刻精品。

2. 燕京仰山寺前杨家 刻书现存有《上生经疏科文》，卷末镌有“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故记，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”题记。

^① 引自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〈契丹藏〉和辽代刻经》，载《文物》1982年第6期。

3. 燕京赵守俊家 在其所刻《妙法莲花经卷第四》的卷首画上，镌有“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”题记。据此可推知赵守俊一家应是当时专门雕印历书的书坊。此经刻印俱精，《辽藏》中《称赞大乘功德经》中亦有赵守俊参加刻版的题记，可知赵氏为当时的著名书坊主兼优秀刻工。

4. 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刻书现存《佛说八师经》。书中镌有“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”题记，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是大昊天寺所刻。但通观文意，当为寺楼下成家所刻。大昊天寺是辽道宗清宁五年(1059年)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等为寺，寺址西便门大街西。^①

二、金代的出版机构

女真族源于唐黑水靺鞨，五代时分布于我国东北松花江、黑龙江下游一带，北宋末年，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，建立金政权。公元1127年，金兵攻陷宋都开封，掳去徽、钦二帝，以及宫嫔、亲王、百工、伶人、医官、儒学、佛僧等十余万人。还将北宋图书及书版劫往燕京，为金人刻书奠定了基础。金贞元元年(1153年)，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，改燕京为中都，燕京遂成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设立秘书监，掌管经籍图书，校书郎专掌在监文籍，国子监掌印行书籍。由于金人在天德三年(1151年)置国子监养士，至大定年间，国子监学生与各地府学学生总数达1400人以上，学生对经史典籍的大量需求，促进了金代的出版业的发展。当时金人辖地分为十九路，其中刻书地点可考者有九路，而以中都(燕京)、南京(汴京)、平阳、宁晋等地为中心。

(一) 官方出版机构

^① 详见《北平庙宇志通检》。

金代官方出版机构可考者有国子监、国史院、印造钞引库、都水监等。还有出版机构未详者，如金章宗承安五年（1200年），“尚书省进《律义》。”泰和元年（1201年）十二月，司空襄以下等进《新定律令敕条格式》五十二卷，辛丑，诏颁行之。”^①泰和八年（1208年），“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。……诏颁《捕蝗图》于中外。”^②以上图书，很有可能是由尚书省组织出版的，可惜我们已无法确认了。

1. 国子监 金朝官方出版机构首推国子监。《金史·选举志一》：“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，始置于天德三年（公元1151年）。……凡经，《易》则用王弼、韩泰伯注，《书》用孔安国注，《诗》用毛萇注、郑玄笺，《春秋左氏传》用杜预注，《礼记》用孔颖达疏，《周礼》用郑玄注、贾公彦疏，《论语》用何晏集注、邢昺疏，《孟子》用赵岐注、孙奭疏，《孝经》用唐玄宗注，《史记》用裴骃注，《前汉书》用颜师古注，《后汉书》用李贤注，《三国志》用裴松之注，及唐太宗《晋书》、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显《齐书》、姚思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魏收《后魏书》、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、令狐德棻《周书》、魏征《隋书》、新旧《唐书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，《老子》用唐玄宗注疏，《荀子》用杨倞注，《扬子》用李轨、宋咸、柳宗元、吴秘注，皆自国子监印之，授诸学校。”上述诸书，不是金人新雕，而是利用北宋旧版修补重印。下列二书，当是金人新雕印行：

金世宗曾问右丞耶律履（字履道）宋名臣中谁最优秀，履道认为当以苏轼最佳。履道“明日录轼《奏议》上之。诏国子监刊行。”^③

东莱人刘迎，字无党，自号无诤居士所著“诗文集”号

① 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58页。

② 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第285页。

③ 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卷1第20页。

《山林长语》”。金章宗“诏国学刊行”。^①

通过上述两则史料，我们可以知道金代国子监不仅刊印供士子学习用的正经正史，同时，也刊印过个人的诗文集。

金朝统治者还组织人力用女直（即女真）语翻译并刊印了一批经史要籍，这在《金史》中屡有记载：

“自大定四年，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。”^②

大定“五年，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《贞观政要》、《白氏策林》等书。六年，复进《史记》、西（两）《汉书》，诏颁行之。”^③

大定二十三年（1183年）八月，金世宗“观稼于东郊。以女直字《孝经》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”。九月，“译经所进所译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扬子》、《文中子》、《刘子》及《新唐书》。……命颁行之。”^④

上述用女直语翻译的典籍，虽然未注明刊印机构，但根据内容，由国子监刊印的可能性较大。

2. 国史院 金章宗泰和六年（1206年），寿州人魏全被宋将李爽兵所俘，“爽谓全曰：‘若为我骂金主，免若死。’全至城下，反骂宋主，爽乃杀之，至死骂不绝口。”金主封赠甚厚，“仍以全死节送史馆，镂版颁谕天下。”^⑤史馆即国史馆，详见《金史·百官志》。

3. 都水监 “掌川泽、津梁、舟楫、河渠之事。”^⑥“大定二十年及明昌四至五年，黄河屡次决口。金都水监颁印《河防

① 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卷17第1页。

② 《金史·选举志一》第1133页。

③ 《金史·徒单镒传》第2185页。

④ 《金史·世宗本纪》第184页。

⑤ 《金史·忠义·魏全传》第2640页。

⑥ 《金史·百官志二》第1276页。

通议》。”^①

（二）寺院与道观

1. 弘法寺 女真族与契丹族一样崇信佛教。“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年）后明昌六年（1195年）前，济州普照寺智照和尚听说京师弘法寺有藏经板（即《赵城金藏》经板），特地从山东赶去该寺，用钱二百多万，印造两部藏经以归。”^②这说明曾在辽代雕印过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》和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》等经卷的燕京弘法寺在金代仍然是藏经、印经的重地。

2. 十方大天长观 金人不仅信佛，尤崇道教。金世宗时，出内府公帑巨万，耗时八年，重建中都十方大天长观。由于信徒众多，对道书的需求亦随之增多。各地道观不仅有零星道书刊行，还刊印了规模较大的《道藏》。大定二十八年（1188年），金世宗下诏，以南京《道藏》经板调入中都天长观。“天长观旧贮藏经，缺而未完，以藏于飞玄阁之藏经，与玉虚观藏经对调。提点观事孙明道又分遣黄冠，访遗经于天下。凡得遗经千七十四卷，补板者二万一千八百册有奇，积册八万三千一百九十八……。明道于是倡诸道侣，商校同异而诠次之，勒成一藏，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，为帙六百有二，题曰《大金玄都宝藏》。这比《政和万寿道藏》多近一千卷，是最完备的《道藏经》，刊补于中都。”^③ 虽是补刊，其出版能力仍很可观。

三、元代的出版机构

崛起于塞北朔漠的蒙古游牧民族，为了巩固其靠武力建立的政权，先后采取了尊孔崇儒、兴学立教、举贤招隐、保护工

① 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第254页。

② 同上第257页。

③ 同上第262页。

匠等文治措施。又“置编修所于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”。^①

元世祖至元元年（1264年），“敕选儒士编修国史，译写经书，起馆舍，给俸以贍之”。^②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置秘书监，“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”。^③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元军攻陷临安，世祖“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。伯颜入临安，遣郎中孟祺籍宋秘书省、国子监、国史院、学士院图书，由海道运至大都”。并采纳许衡的建议，“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，及江西诸郡书板，立兴文署以掌之。”^④这些措施，无疑会对当时的文化教育和图书出版起到促进作用。但是，在元代，汉人深受民族歧视与压迫，知识分子地位低下，出版图书更是障碍重重。明代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“元人刻书，必经中书省看过，下所司，乃许刻印。”清人蔡澄《鸡窗丛话》云：“先辈云：元时人刻书极难，如某地某人有著作，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，学使以为不可刻，则已。如可，学使备文咨部，部议以为可，则刊板行世，不可则止。”正由于元代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不信任，以及对图书出版的严格控制，又反过来制约了元代文化和出版业的发展。

元代中央出版机构主要有兴文署、广成局、印历局、国子监等。由于“元时书籍，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”^⑤故中央刻书并不很多，这从中央刻书存世稀少亦可得到证明。元代北京的私宅与坊肆刻书数量亦远逊于建阳、建安、平阳、杭州等地。这大概与北京刻书成本高，官方控制严格不无关系。

（一）官方出版机构

① 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第3459页。

② 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第96页。

③ 《元史·百官志六》第2296页。

④ 清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序》。

⑤ 《天禄琳琅书目·茶宴诗注》。

1. 兴文署 据元代王士点、商企翁《秘书监志》卷七云：“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十一月初七日，太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，兴文署掌雕印文书，交属秘书监。……本署元设官三员，令一员，丞二员，校理四员，楷书一员，掌记一员，事故官一员，杨时煦身故；校理二员，今改大都儒学教授孙英、刘震。见任官二员，署令马天昭、署丞王鼎；校理二员，李嘉、古申；楷书吕勳；掌记赵谦；作头一名，匠三十九名，印匠一十六名。至元十三年十二月，中书省奏：奉圣旨省并衙门内，兴文署并入翰林院王待制兼管。”可知当时的兴文署是一个人员配置齐全的出版机构。它初属秘书监，后又由翰林院兼管。

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元月，“复立兴文署，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。”^①此时的兴文署职权范围有所扩大。其后又属国子监，“掌提调诸生饮膳，与凡文牒簿书之事。”^②此时的兴文署已与出版无缘了。

早期的兴文署刻印的图书，现已无实物可征。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五《资治通鉴》条引元人王磐序云：“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，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，厚给禄廩，召集良工刻刻诸经、子、史版本，流布天下。以《资治通鉴》为起端之首，可谓识时事之缓急，而审适用之务云云。”又据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云：“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刻成（《资治通鉴》）二百九十四卷。又刻胡三省《通鉴释文辨误》十三卷。兴文署《通鉴》，清嘉庆间有胡克家翻刻本。”按：“十三卷”乃“十二卷”之误。

2. 秘书监 元代的秘书监本是掌管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的机构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，兴文署脱离秘书监并入翰林院，

① 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第334页。

② 《元史·百官志三》第2193页。

但“有印造每年历日事务拨附秘书监亲管。王待制牒保作头董济于本监依旧勾当。”^①这说明当时的历书是由秘书监负责出版的，而原刻工作头董济仍留在秘书监中具体负责雕印事务。

由秘书监负责出版历书，这是因为当时“掌观象衍历”的司天监隶属于秘书监的缘故。“司天之隶秘省，因古制也。……至元十年闰六月十八日，太保傅奉圣旨：回回、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。”^②但到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秘书监负责出版历书一职，便被太史院取代了。

3. 太史院 “太史院，秩正二品。掌天文历数之事。至元十五年，始立院。”^③至元“十五年，别置太史院，与（司天）台并立，颁历之政归院，学校之设隶台。”^④在太史院所属官员表中，有腹里印书管勾一员、印历管勾二员，应是负责雕印历书的官员。上述史料证明，元代出版历书一职，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便由秘书监改为太史院了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秘书监，还是太史院出版的历书，皆已不传了。

4. 广成局 “广成局，秩七品，掌传刻经籍，及印造之事。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始置。”^⑤隶属于艺文监。广成局究竟刊印过什么书，现已不得而知了。由于其所隶属的艺文监的职责是“专以国语敷译儒书，及儒书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”，我们可以推测其刻书应以儒家经典为主。而孙毓修在《中国雕板源流考》一书中称：“广成局专一印行祖宗圣训。凡国制等书，皆隶艺文监。”不知孙氏所据何在？

5. 太医院 “太医院，秩正二品。掌医事，制奉御药物，

① 元王士点、商企翁《秘书监志》卷7。

② 同上。

③ 《元史·百官志四》第2219页。

④ 《元史·百官志六》第2297页。

⑤ 《元史·百官志四》第2224页。

领各属医职。”其下属单位中的医学提举司“秩从五品。至元九年始置。……掌考较诸路医生课义，试验太医教官，校勘名医撰述文字，辨验药材，训诲太医子弟，领各处医学”。^①据此可以推知，校刊医书的工作很有可能即由医学提举司具体负责的。元代太医院刊行的医书仅知《圣济总录》一种，刻于大德四年（1300年）。

6. 国子监 元代的国子监隶属于集贤院。“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始置监祭酒一员，从三品，司业二员，正五品，掌学之教令。”下设诸官中有“博士二员，掌教授生徒、考较儒人著述、教官所业文字”。^②元代国子监刻书仅知一种与其职责无关的医书，即刻于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的《伤寒论》。

（二）书坊

燕山活济堂 堂主窦桂芳兼有医生和书坊主的双重身份，故所刻图书以医书为主。已知活济堂出版的医书有：《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》、《伤寒百证经络图》九卷。又仿儒家《四书》而刊印《针灸四书》八卷，后附自著《针灸杂说》一卷，镌有“皇庆壬子中元燕山活济堂刊”木记。按：皇庆壬子即元仁宗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。天一阁藏本存六卷。^③

除燕山活济堂刻书外，还有《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》、《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》等元杂剧，显然均出自北京书坊，可惜不知为哪家书坊所刻。

（三）私宅

1. 燕京中书侍郎宅 耶律楚材（1190—1244年）为辽东丹八世孙，金右相耶律履之子。后得元太祖、太宗倚重，官至中书令。曾西游数万里，所著《西游录》，元太宗己丑（1229年）

① 《元史·百官志四》第2222页。

② 《元史·百官志三》第2193页。

③ 参见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第283页、第285页。

元旦刊于燕京私邸。其时官任中书侍郎，故有“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”字样。此书刻本今已失传，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抄本一册。耶律楚材还刊行过自著《心经宗说》一书。又曾发起募缘补刊《大藏经》板，详见《湛然居士文集》。

2. 姚枢宅 姚枢，字公茂，柳城人。少力学，有王佐才。元太宗十三年（1241年），任燕京行台郎中。后因故弃官，“携家来辉，垦荒苏门……，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，自版《小学》书、《语孟或问》、《家礼》；俾杨中书版《四书》、田和卿版《尚书》、《声诗折衷》、《易程传》、《书蔡传》、《春秋胡传》，皆脱于燕。又以《小学》书流布未广，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恬板，与《近思录》、《东莱经史说》诸书，散之四方。”^①“恬板”，李致忠《历代刻书考述》所引作“活板”，并且认为：“所谓的‘为沈氏活板’，其实指的就是按照宋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载的毕升的泥活字摆印的方法。”^②如果其说成立，那么，这便是泥活字法发明后二百年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大胆实践，它比清代李瑶和翟金生仿毕升泥活字法早了大约六百年。做为私宅印书，姚枢的成绩是颇为可观的。可惜皆已失传，令我们无缘一睹其印书的风貌了。

① 元姚燧《牧庵集·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》卷15，清乾隆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本。

② 李致忠《历代刻书考述》第194页。